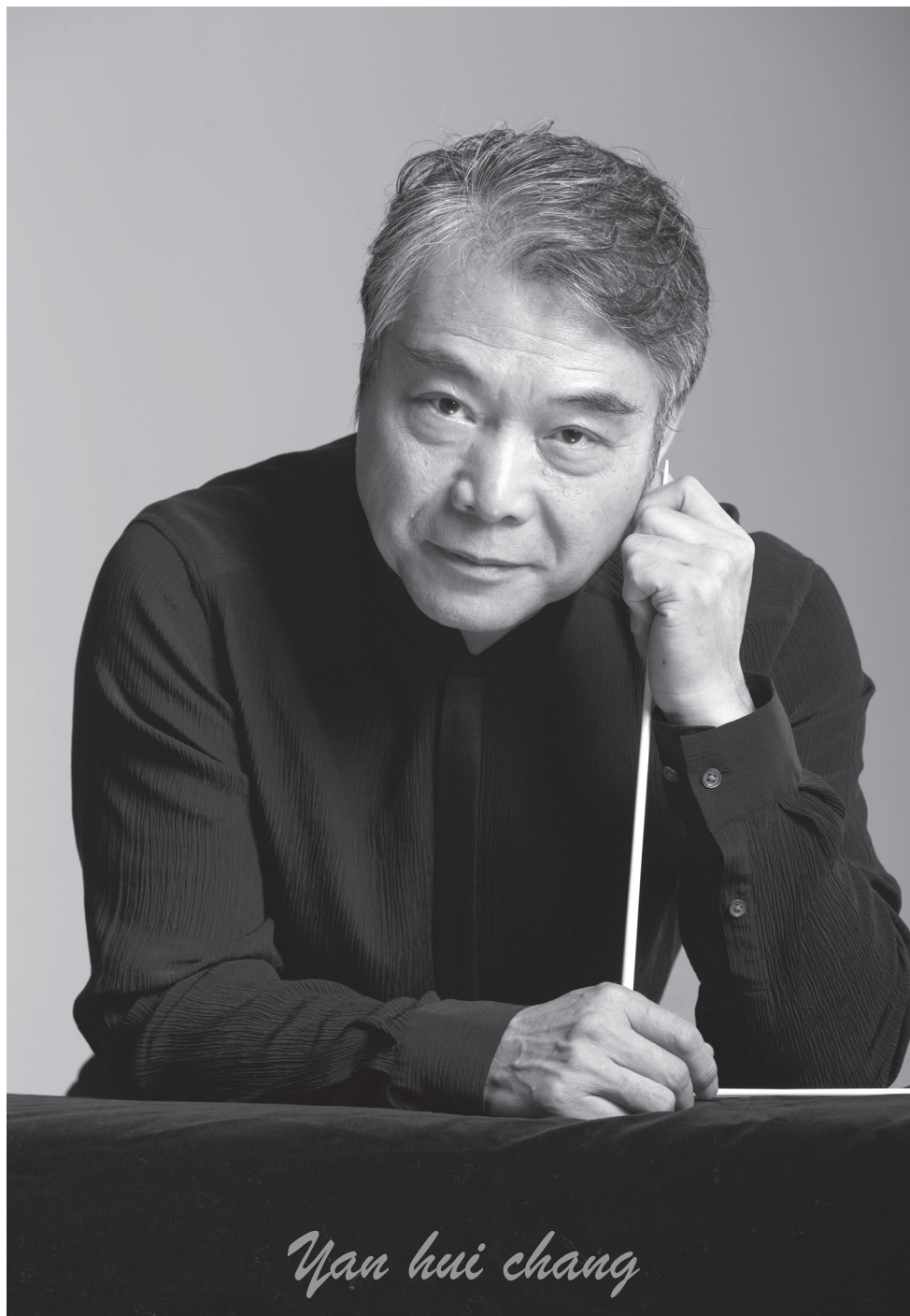




Yan hui chang

阎惠昌

乐之缘·感恩

阎惠昌

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西北山沟长大的我，自儿时碰触那第一件乐器——笛子开始，“音乐”就像一个巨大的磁石将我从陕西山乡带入西安、上海、北京、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等世界其他地方，走过的艺术轨迹和历程代表着我与音乐的不解之缘。

陕西音乐传统乃汉唐遗风，那个至今还只有三户人家的陕西潘家山半沟村给予我大自然灵性。那里的山、水、人，那里深厚的中华文化，让我在一个原生态的艺术氛围中成长，这些活生生的民间艺术体验，影响至深。感谢合阳县城关小学老师破格让我参加学校的教师乐队，成为众老师中唯一的学生成员。这应该就是我初次跟

民族乐队结下的不解之缘。难忘合阳县中学校长在音乐老师出缺的情况下，不但放心让我一个高中生兼任初中音乐课，还让我使用学校的乐器储藏室，接触各样中西乐器，组建我的第一个学生混合乐队。永远感恩我敬爱的父亲，他在我十岁的时候跟我说：“我看你在音乐上很有天分，将来你长大了送你到音乐学院读书。”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将到音乐学院读书变为我的努力目标。1972年，陕西省艺术学校（即西安音乐学院）来县招生。结果，老师被我这个手执自己创作并配好伴奏的歌谱及会多种乐器的乡野孩子所感动，我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音乐学院。

西安音乐学院分配我跟王兴印老师学习三弦，并担任民乐系合奏课的课代表。半年后，我的主课老师调离学校，在我没有主课老师的情况下，指挥鲁日融教授便说：“阎惠昌会很多乐器，组织能力强，学三弦有点浪费，你就学指挥吧！”他举荐我跟管弦系指挥刘大冬教授学习指挥技术和理论，刘大冬老师让我通过西洋古典交响乐作品掌握初步的指挥技术，更让我在管弦乐队里面帮忙，为日后指挥专业发展打下重要的基础。鲁老师则提供了我实践民乐队指挥的机会，曾记得我当时疯狂地将钢琴协奏曲《黄河》第一乐章改编为民乐合奏，鲁老师竟然让我指挥学校民乐队的同学试奏！鲁老师更让我跟随饶余燕、强增抗等教授学习作曲理论。正因为此，让我其后在上海音乐学院招生中作曲科目考得西北区第一名的好

成绩！

西安音乐学院是我专业音乐生涯的始发站，管弦系指挥刘大冬教授是我的首位指挥导师，而著名二胡演奏家、教育家、学院民乐团指挥鲁日融教授则是按下我指挥生涯按钮的第一人。正如鲁日融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的访问中忆述：“就是我们共同把他推上指挥的道路的。”

1975 年完成课程，学校新的戏曲系需要指挥来组建系里的乐队教研室，我有幸被鲁日融教授推荐留校受聘，出任戏曲系乐队教研室指挥和负责人。在戏曲系乐队教研室的三年，让我从小就接触的民间戏曲得到专业的再认识和整理，从唱腔设计、主旋律写作、中西混合乐队的配器、排练及与导演配合演出实践中进一步学习、掌握戏曲艺术的真谛。

1978 年上海音乐学院进行“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招生。学校只招收一名“民族乐队指挥”，我抱着“试一下”的心情走进考场，结果我有幸考获全国唯一的民乐指挥名额，其兴奋程度犹如高中状元！当时的“上音”成立了新的“民族音乐理论作曲系”（民理作），我则是五名新生中唯一的民乐指挥专业。系里开设的课程如下：

1. 指挥主课：夏飞云教授

（夏老师鼓励我去旁听黄晓同、马革顺等所有教授的课）

2. 作曲主课（民乐指挥必修）：胡登跳教授、何占豪教授

3. 合唱指挥：马革顺教授、张民权教授
4. 交响乐总谱读法及艺术辅导课：周璐德等教授
5. 专为指挥专业开设的视唱练耳课
6. 民族管弦乐乐器法及配器法：胡登跳教授
7. 西洋交响乐队乐器法及配器法：茅于润教授
8. 钢琴及合唱写作：王久芳教授
9. 民族化复调课：刘福安教授
10. 赋格及对位课（复调、旁听）：陈铭志教授
11. 和声课：沈一鸣教授
12. 民族器乐体裁与形式课及曲式课：叶栋教授
13. 民族器乐概论：李民雄教授
14. 中国戏曲概论：刘国杰教授
15. 中国曲艺概论：连波教授
16. 中国民歌概论：江明敦教授
17. 中国打击乐：李民雄教授
18. 钢琴演奏：李素梅教授（作曲系专任钢琴课教授）
19. 民族器乐演奏琵琶（2年）：孙雪金教授
20. 中国古代音乐史：陈玲群教授
21. 西方音乐发展史：钱仁康教授
22. 现代作曲家及名作：朱健教授

23. 作曲系每周一次的最新研究论文发表讲座，研究生汪成用的“现代和声思维”及桑桐教授“五声化和声写作”等教授讲座以及其他共同课。

当时“上音”规定“民理作”系的学生除了必修钢琴以外，一定要学一件民族乐器。我当时便选择了民族乐队中弹拨乐器最具代表性的琵琶，跟孙雪金老师学了两年。正因为曾学习演奏琵琶，让我有机会获得1980年首届琵琶大赛新作品首奖。丁善德副院长更请胡登跳教授转告我若愿意改学作曲，他会亲自教授。丁院长要亲自教我，这对我来说简直不敢相信！然而，我仔细斟酌后，认定自己的抱负是指挥，婉拒了可能改变一生事业路向的机会。

回想起来，“上音”给民乐指挥、作曲专业学生在器乐及其他相关的训练几乎是全方位的。例如跟随李民雄大师学打击乐，他除了教授学生演奏诸如排鼓、十面锣、板鼓等具有难度的打击乐器，亦让学生学习京剧锣鼓，每次轮流演奏不同乐器，以求了解个中奥秘。他要求学生自己演奏自己为各种中国打击乐器所写的片段，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何改善，终生受用。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指挥课，除了民乐指挥曲目外，还有大量的交响乐作品及合唱作品。合唱指挥课由马革顺教授主讲，马教授对于音乐的结构、句法、逻辑重音，以及欧美、俄罗斯不同音乐学派对于音响声部的比例，审美演变都有极为深刻的阐述。而马先生对

于中国戏曲的咬字吐字、四呼五声、字头、字腹、字尾的演唱、归韵都有极为传神的讲授。对于合唱队的发声训练、经典曲目的演绎更是日后我处理合唱作品的座右铭。

夏飞云教授的指挥课极为严格，讲究处理琢磨每一个乐句每一个音之间的连接关系，要从若干个处理方案中寻求最具有逻辑性、有韵、有神、有神的音乐处理方式。在指挥技术上强调指挥要指尖传神，手上有韵。他指出民乐指挥要能够表达出中国音乐特有的神韵和意境，必须要在熟练掌握各种挥拍技术的基础上，广纳中国武术、太极、剑术、书法、绘画、戏曲等中国传统艺术中一切与线条、造型、意境、审美有关的知识，充分利用身体各个不同器官、部位和动作幅度、表情来表现乐曲中不同乐器的特定语言、韵味，展示乐曲的神采，对于音乐的起承转合结构、抑扬起伏布局有着极高的标准要求。记得我曾因无法细致地用指挥手法表达乐曲中特有乐器的吟揉推拉、气息极长的乐句铺垫、均匀慢速的准确挥拍技术而被老师多次严厉批评的情况下，一度失去学习指挥的信心。幸而老师在我面临自信心危机时坚定地告诉我：“你当然是可以指挥的，我对你是‘恨铁不成钢’啊！”当日如果夏老师讲了一句“你不能”，也许阎惠昌这个名字就与指挥无缘了。

在我学习指挥过程中，曾经有一段时期学院把“民理作”系取消，将我们拨归作曲指挥系，我的专业也改为“交响乐队指挥”。1981

年学校又恢复民族音乐系，我继面对选择作曲与指挥之后，又再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继续交响乐指挥专业学习，或转回民乐指挥。这次，在系主任再三劝告我三思的情况下，我毫不犹豫选择了转回“民理作”系，我深信民族乐队是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在这个领域里学校老师所传授的知识，一定会在民族乐队这个领域发挥自己所长。但是，在校期间接受的交响乐训练，却为日后与当时的中央乐团合作，多次地录音赵季平大师的电影音乐获得国际音乐大奖，北京音乐厅爱乐交响乐团获得中国台湾唱片金鼎奖，指挥中国交响乐团举行韩兰魁教授作品专场 DVD 获得中国唱片金奖等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我感恩夏飞云教授、胡登跳教授、何占豪教授及上海音乐学院所有的老师，让我在西安音乐学院原有的基础上，打下指挥、作曲及更全面的坚实基础，为未来的工作做好了扎实的准备。

1983 年在上海电影民族乐团演奏厅，举行了我的毕业音乐会，除了经典古曲外，首演了我的第一部大型民族乐队作品《民族交响音画——水之声》，及作曲专业同学的三部新作品。而毕业音乐会《水之声》的录音更被我的作曲老师选去参加学校及全国第三届民乐作品比赛，分别获得学校一等奖及全国二等奖。无限感恩当时的电影乐团乐队队长、笙演奏家翁镇发先生，没有他的极力推荐，就没有乐团团长的邀约，就没有《水之声》的诞生和获奖。感恩何占豪老师逐个音符地帮我指导修订《水之声》！感恩在我毕业即将进

入社会工作遇到政策困扰时，何占豪教授以非凡的魄力和行动，给予学生最坚定的支持和鼓励！师恩难忘！

与彭修文大师的乐缘，来自于1983年毕业前，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几次派专人来学校洽谈我去乐团工作，其后更提前邀约我去北京与乐团工作三个月，这让我跟彭大师及广播民乐团结下了深厚的乐缘。彭大师对我说：“欢迎你到广播民乐团，希望你真的可以调过来跟我们一起工作，做我的助手。”这番话让我一直难以忘怀。但由于政策的原因，我无缘到广播民乐团担任彭修文大师的助手。我被文化部分配到中央民族乐团出任乐团首席指挥，并兼任乐队副队长。

在中央民族乐团期间，于1985年我有幸参与国际知名的荷兰飞利浦唱片公司首次以数码技术灌录中国民族管弦乐作品。这张由我指挥，中央民族乐团灌录，作曲家李焕之先生亲自监制的《汨罗江幻想曲》唱片，便是全球首张由国际名牌唱片公司录音发行的大型民族乐队激光唱片。而于1987年更以年轻指挥身份与彭修文和朴东生两位前辈共同指挥千人大乐，为首届全国艺术节揭幕。乐团提供给我的这些机会让我在国家级的乐团内不断得到磨炼和成长。

1992年，受新加坡拿索斯唱片公司邀约到新加坡工作。三年的唱片监制、指挥及以计算机作曲和录音等工作，为我积累了重要的系列化创作经验。

1993年首次与中国台湾国乐团（原实验国乐团）结台缘的音乐会，被台湾BBS网站评为年度最佳指挥、最佳古典音乐会。这乐缘于二十年后的2013年终于再续，被邀出任中国台湾国乐团客席指挥继而出任音乐总监。

1995至1997年担任我国台湾省高雄市国乐团驻团客席指挥期间，邀约偶像彭修文大师到高雄客席，全程的陪伴及近距离的学习，让我真正被大师接纳成为他的弟子，我深爱彭大师的音乐和处理音乐的方式，大师深厚的国学修为和博学对我影响至深。

当1996年我还在高雄工作时，中国香港中乐团邀请我出任彭修文大师的副手，我真的兴奋万分，以为终于有缘能成为自己偶像彭大师的助手！然而，彭大师的突然离世，让我这个美梦落空。市政局官员告知我彭大师原早已向香港中乐团表示因健康原因，在他的三年任期后由我来接任的计划，希望我可以在香港回归前临危受命，接掌香港中乐团总监一职。在无限悲痛和彷徨中，我走上音乐总监的岗位。

在我的指挥专业路上，曾在不同时期出现过十字路口，作曲、西方管弦乐指挥、唱片监制等，命中缘分安排了我走向民乐指挥之路。然而，即使我十分渴望能成为我的偶像彭大师的助手，从实践中向他学习，冥冥中却注定我始终“无缘”充当他的助手。

从未想到于1987年6月和香港中乐团首次结缘客席，相隔十

年后的1997年6月，我居然到职香港中乐团，以艺术行政管理见称的香港中乐团为我提供了一个展现艺术理想的平台。十九年来，乐团经历了公司化、推行乐器改革、优化编制、海内外巡演、三创健力士世界纪录、成立乐队学院、培育本地人才计划、新作品委约、委编从1350首增加到2300余首，多项音乐节、研讨会，首创大型中乐作曲比赛、国际中乐指挥大赛、推展艺术教育以至灾后筹款及其他活动等等。在乐团的定期音乐会和外访中，我指挥了约500场，其中率团外访演出共约117场，首演作品共421首（其中372首为HKCO委约），作曲家国籍包括中国（含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欧美及非洲等。

感恩香港中乐团理事会及全体同仁的信任和努力，感谢香港政府及市民的支持，让我在香港中乐团发挥所长，与香港地区以及来自于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艺术家绽放艺术光芒，走向世界，推广中乐艺术之美，发挥香港文化大使的神圣使命。感恩中国台湾传艺中心及台湾国乐团的结缘，让我可以以己所长，为宝岛国乐发展和国乐演奏、指挥、作曲人才的养成尽自己的心力！

中国人讲的“缘”很神奇，也许是儿时父亲的一句话，让我和“音乐”结缘。过去，我有幸在音乐的成长路上获得恩师栽培。今天，我受邀于各地举行指挥大师班和研习营、指挥硕士课程等，就是希望将我在指挥艺术上所学、所悟的点滴体会和经验，传授给青年才

俊，让民族乐队艺术得到国人乃至世界的喜爱。我喜见国内外很多才华横溢的指挥新秀于 2011 年我倡议创办的全球首个“国际中乐指挥大赛”中崭露头角。发展和向世界推广中乐艺术其路漫漫，需要更多矢志中乐艺术的有缘人乐此不疲，共同努力。我希望看到越来越多“乐”此不疲的有缘人加入队伍，一同来感受中国音乐的魅力和发展它的未来！

（本文摘编自《一位指挥家的诞生——阎惠昌传》，阎惠昌口述，周光蓁著）